

增长的质量



世界银行 2000

增长的质量

Vinod Thomas
Mansoor Dailami
Ashok Dhareshwar
Daniel Kaufmann 著
Nalin Kishor
Ramón López
Yan Wang

本书翻译组 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为世界银行出版

The Quality of Growth

Copyright © 2000 by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1818 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3, USA

This Wor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in English as *The Quality of Growth*.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prepared and produced by China Financial and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and is not an official World Bank translation. The World Bank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and accepts no responsi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consequence of its interpretation or use.

增长的质量

©2000 年, 版权所有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本书原版由世界银行以英文出版, 书名为《增长的质量》。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组织翻译并出版, 并非世界银行的官方翻译。世界银行不保证翻译的准确性, 也不对本书的解释或使用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

本书所表达的观点、说明或结论是作者与合作编撰人员的看法, 未必反映世界银行和执行董事会或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观点。世界银行不保证本书数据准确无误, 并对任何人引用其中的观点和数据引起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本书所附地图的疆界、颜色、名称和其他资料, 并不表示世界银行的任何部门对任何地区的法律地位的看法, 也不意味着对这些疆界的认可或接受。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0-346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增长的质量 / (世界银行) 托马斯等著; 《增长的质量》翻
译组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2
ISBN 7-5005-5010-3

I. 增… II. ①托…②增… III. 经济增长—研究
IV. F0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842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发行处电话: 64033095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6 开 17.5 印张 271 000 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ISBN 7-5005-5010-3/F·4478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值此新千年开始之际，人类取得了众多可资庆贺的成就。今天诞生于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与 50 年前出生的儿童相比，预期寿命要长 25 岁，健康和教育状况也得到了改善，生产力也有所提高。民主思潮的传播为全世界亿万人民带来了新的自由天地和前所未有的机会。电信革命则预示着人类普遍获取知识的光明前景。

但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就会发现还存在着另外一些问题——一些应引起警觉的问题。在除中国以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数至少比 10 年前多 1 亿。贫富差距更加明显。在很多国家，艾滋病的泛滥已冷酷无情地降低了人们的预期寿命——在某些非洲国家降低了 10 岁以上。有 10 多亿人依然缺少安全的饮用水，而每年死于水生疾病的儿童更是有 240 万名之多。有多达 10 亿人在进入 21 世纪时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仅在农村地区，每年就有约 180 万人死于室内空气污染。森林正在以每秒种一公顷的速度遭到破坏，由此造成的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

以下是对于我们存在的不足之处的基本估量：尽管有部分人走上了致富之路，但还有很多人的生活质量仍然令人失望。某些国家经历了近 20 年的经济迅速增长，但其他国家并未因此而受益。在很多情况下，政策总是有利于精英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而不能促进对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充分投资，而这对广义的增长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要减轻贫困，并使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就应从根本上重视构成发展的各种因素的质量。这便是本书的主题。

改善穷人的生活质量就要提高收入。这要求制定和建立有利于持续增长的政策和机构。提高收入和改善生活质量还要作大量工作——改善工作和受教育的机会并使之更平等，提高健康和营养水平，使自然环境更加清洁并更具可持续性，建立公正的司法体系，扩大民众和政治自由，建立可信赖的和透明的机构，以及自由地获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世界银行最近出版的著作《穷人的呼声：能听到我们的意见吗？》强调的就是这个主题。世界各地的贫困男女着重关注的不仅仅是物质的富足，他们尤为注重的是尊严的重要性，是尊重、安全和性别问题，以及清洁的环境、健康和社会的包容性。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若干方面也会改善，但不会是全部，也不会是以同样的速度，甚至不会是必然改善。在不同国家，即使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同，但在教育、健康、民众自由，公民对影响其生活的决策的参与，腐败的清除，以及环境质量和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改善程度，却总会迥然不同。本书论述的是增长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对每个人的生活质量都是至关重要的。

世界银行的战略是通过减贫这个焦点来设计和评估其业务活动，这个观点已反映在我们开展工作的国家中我们所采用的综合发展框架中。该框架鼓励各国追求均衡的发展方式，同时努力改善人力、社会、自然和物质方面的状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的成果才能被人类广为分享并得以持续。

在对这些互补的方面进行整理排队时，这种综合性的框架还试图将发展的关键因素汇集在一起。它将机构、治理结构、公司责任，以及包容、发表意见、自由和参与等问题置于与普遍的经济问题和决策同样的地位。在同时解决这些互有联系的问题时，框架强调的是该国领导作用的必要性，以及在推动发展议程的过程中，政府、私营部门、民众社会和国际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我们保证不但在财力上支持这个框架，还要用更多先进的学习和知识规划来支持，这些规划要使用新数据、新工具和方法，而且得到最新信息和电信技术的支持。

的确，当我在各大洲间旅行时，不论是农村的农民还是拥挤的市中心的市民，都时常提醒我，对他们而言，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超过了单单融资所带来的贡献。这种质量是指女童和男孩受教育的机会，是当他们毕业后获得工作的机会。它是指农村穷人去乡村卫生所时得到基本药品的可能。质量意味着空气和水的洁净和保持宝贵的生物多样性

性。它意味着穷人可以享有的尊严及其生活的保障。它是指人民与政府中的改革者一道参与反腐败计划的实施。它还意味着反对经济精英集团的既得利益，这些人可以不正当地影响、甚至操纵着国家的政策、法规和法律。

本书创造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即要重视这些政策和机构问题，并要带着国家自我掌握命运的概念来重点解决这些问题，还要顾及发展进程中各参与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本书说明，投资于民，维系自然资源，应对风险和改善治理结构等，都是构成质量增长的因素。正是这种更大幅度的加速增长，才能最有力地促进减贫事业，促进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使全体人民均能共享质量得以改善的生活。



J.D. 沃尔芬森
世界银行集团
总裁

中文版序言

贫困问题在过去 10 年中变得更为严重了。为了扭转这种局势，至关重要的是促成经济增长。但经验表明，决定福利改善程度和哪些人的福利得以改善的，不仅仅是更普遍的增长，而且还有更高质量的增长。有些国家的收入和增长水平不相上下，但在教育、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却截然不同。在诸如中国、印度和巴西这类较大的国家中，增长对贫困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在寻求解决方案时，要超越目前发展项目和计划普遍提供的标准答案范围。

我们是本着长期征询中国读者意见的态度向中国读者奉献这本书的。他们在实现了大幅度的广基增长后，最有资格向我们提供怎样做有利，怎样做不利的反馈意见。我同时相信，本书的内容与中国的情况最为密切相关。在经历了 20 年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翻两番之后，出现了一些急待解决的质量问题，如地区收入不均衡，机会的不平等问题更加突出，环境退化，金融规章制度不健全，以及公共机构能力薄弱等问题。其中很多问题要在中国即将开始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加以解决。

首先，教育和医疗卫生投资的严重差异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缺少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教育方面的差异是增长对印度喀拉拉邦贫困的影响之所以比对比哈尔邦的影响大五倍的原因。各国间教育机会的国际差异是巨大的。根据一份有关 85 国的近期调查，波兰、美国、加拿大和捷克共和国能提供最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另一端，埃及、

印度、巴基斯坦和突尼斯等国的教育不平等程度则要高出 4—5 倍。在中国，受教育的情况长期以来不断改善，但由于政府的教育开支不足（占 GDP 的 2.2%），近来有数百万儿童辍学了。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讲，这种局面造成的代价都是非常高昂的。此外，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正在迅速扩大，它已从低于印度的水平（基尼系数低于 0.20）上升到接近美国的水平（1998 年基尼系数为 0.40，有人估计，如果包括非正规经济，基尼系数应为 0.51）。这意味着，在中国总收入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中，减贫率下降了。

第二，改善环境质量和保护自然资源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福利的改善，对穷人来说尤为如此。空气污染，尤其是高水平的总悬浮颗粒物，已造成曼谷、北京、雅加达和新德里等城市地区人民的早亡，造成对健康的严重损害。据估计，中国 11 个城市早亡和疾病造成的费用超过了城市收入的 20%。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的部分原因是政策失当，它在 1997—1998 年间造成的直接损失至少为 80 亿美元，对穷人造成的危害可能超过了金融危机的危害。但环境退化造成的成本大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发展中国家报告的国内资源总储蓄率约为 GDP 的 25%，工业国的这个比率约为 21%。但用环境资本的剥夺对此作调整后，这两组的储蓄率估计都将缩水为 14%。

第三，公共机构软弱无力和缺乏对法律的尊重阻碍了增长，特别是还伤害了穷人。在某些转轨中国家，大范围的腐败使国内“精英”和某些多重国籍拥有者能以他人的牺牲为代价，操纵政策和法律为其所用。最近的研究表明，强化法规的执行和减少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发生的腐败能使长期内平均收入增长两倍以上。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有助于减少腐败，提高社会支出和安全保障网络的效率，还能提高投资的生产率。

政策分析和咨询经常忽略了上述问题，其结果是这些问题在实践中也被忽视了。一国的财富不仅包括有形资本，它还包括人力、机构和自然资本。有证据表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系统性地不足，对机构性资本关注也不够，对自然资本则是开采过度。同时，有形资本的使用继续得到大量补贴。在全球范围内，农业、能源、道路交通和水在过去 10 年中每年得到的补贴总额为 7000 亿至 9000 亿美元，其中 2/3 发生在工业国（占 GDP 的 3%），1/3 在发展中国家（占 GDP 的 5%）。

这些质量问题对于穷人和所有人来说都是核心问题，对于经济发展更具重要性。有人会问提出这份内容广泛的议程是否过于雄心勃勃？其实不然。对一个大国的政府来说，质量议程不是难以启齿的需求。相反，它是一份邀请函，邀请社会所有成员在对市场有利的政策框架内，参与到发展中来。这就要求同时加强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的能力。

我们奉献本书是想为目前关于发展思维的讨论作些贡献。随着经验教训的出现，我们都需要继续学习。作为其咨询进程的一部分，世界银行一直在组织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和论坛。在构想中国的未来和世界发展问题方面，中国读者的意见将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感谢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的 Deepak Bhattasali，以及李莉和李胜女士，他们领导和支持了本书在中国的出版工作。

前言

90年代意味着一个世纪和一个千年的终结，是一个全面回顾人类发展状况的阶段。一系列的研究报告重新审视和评估了发展的某些基本原则。持续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地成为减轻贫困的根本原因。发展的历程确认了某些改革对维系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的增长是有效的，这类改革包括：更多和更有效地投资于教育和医疗卫生，减少贸易与投资的壁垒，取消对农业和工业的国内价格控制，以及减少财政赤字。90年代经济大潮的涨落都明确地证实了这些关系。

评估结果也揭示了某些至关重要的差距。国家决策、建议和条件及外部机构融资所一向缺乏的是充分注意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舍此便无法真正发挥改革的潜能。

由于我们已充分理解了发展进程，而且这种理解还因经验的积累而加深，评估报告因此而重点论述了发展思维在过去50年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然而理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有些人就认为“华盛顿共识”仅仅是一项开放市场的政策规章。对《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的有利于市场的方法，有些人则将其含义引申为市场附加观点，它既涉及开放，又包括国家和其他有关方面强有力的积极作用。

尽管理解有所不同，评估报告对政策与机构之间的互补性和平衡的某些关键教训还是逐渐形成了共识。至关重要的是能正常运转的市场和开放。但是也要承认在改革进程中市场的局限性，承认政府和其他有关方面基本作用的局限性。

基于经验的期望有时能得以证实，有时则不能。以前的讨论曾预

测，像缅甸、菲律宾和某些非洲国家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会取得成功，而像韩国和新加坡这类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会失利。转轨国家能通过开放市场而迅速发展这一预测也未能实现。北美洲和欧洲工业国生产率的增长在 80 年代放慢了速度，这与日本的显著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一切都促使人们呼吁增长模式的变革。

现实情况有时达不到预想目标，其原因是全球形势和当地情况的变化削弱了所采取的行动的影响，并且迫使政府修改优先发展事项的顺序。在 19 世纪末，“重工业第一”似乎是前进的最佳选择；而在 20 世纪末，信息技术似乎成了成功的关键。随着市场在近几十年中的开放，令人失望的结局已显露出为使市场运转而进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我们在构建发展思维时，持续不断地提出征询和收集反馈意见，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向读者奉献出这本专著。它是写给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的决策者、企业家和其他人的。它再次确认了有利于市场的政策对发展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它还强调指出了若干被忽视的关键问题，并列举了最新证据。本书不是对发展的全面审视，它所探讨的是那些作为行动的基础而常常被忽略的根本问题：机会，尤其是教育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风险管理；以及治理结构和反腐败。本书并不能解决下列这些重要问题：变革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不稳定的影响，以及像 HIV/艾滋病这类可传染疾病的后果，也不能解决跨境的和全球性问题的影响——如人口压力、劳动力迁移、全球变暖、信息技术，以及全球金融和工商架构等问题。本书的结论是，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增长的质量也是如此。

本书是由世界银行学院的一个小组撰写的，世界银行通过研究赠款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支持。本书被用作发展课程的学习材料之一以及以下两份报告的背景文件：《1999/2000 年世界发展报告：迈进 21 世纪》，《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本书源于斯坦利·费舍尔先生在 1998 年关于发展经济学的世界银行年会上提交的主旨文件及讨论。写作小组受益于世界银行内外众多人士的意见。这里尤其应感谢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建议的人士。他们包括：Nancy Birdsall, Paul Collier, Eduardo Doryan, Ravi Kanbur, Mats Karlsson, Gautam Kaji, Rung Kaewdang, Vijay Kelkar, Mohsin Khan, Aart Kray, Nora Lustig, Rakesh Mohan, Mohamed Muhsin, Robert Picciotto, Jan Piercy,

Jo Ritzen, Lyn Squire, T.N. Srinivasan, Nicholas Stern, Thomas Sterner, Joseph Stiglitz, Anand Swamy, Shahid Yusuf, 章晟曼和《2000/2001 年世界发展报告》写作组。

本书写作人员感谢以下人士为本书提供的材料: Montek Ahluwalia, Jane Armitage, Kaushik Basu, Surjit Bhalla, Jan Bojo, Deepak Bhattasali, Gerard Caprio, Shaohua Chen, Kevin Cleaver, Maureen Cropper, Monica Dasgupta, Shanta Devarajan, Ishac Diwan, David Dollar, William Easterly, Gershon Feder, Andrew Feltenstein, Deon Filmer, Pablo Guerrero, Cielito Habito, Kirk Hamilton, Jeffrey Hammer, Joseph Ingram, Farrukh Iqbal, Ramachandra Jammi, Emmanuel Jimenez, Mary Judd, Philip E. Keefer, Homi Kharas, Elizabeth M. King, Kathie Krumm, Ashok Lahiri, Kyung Tae Lee, Andres Liebenthal, Magda Lovei, Muthukumara Mani, Michele de Nevers, David Nepomuceno, Jostein Nygard, Michael Pomerleano, Tanaporn Poshyananda, Lant Pritchett, Martin Ravallion, David Reed, Neil Roger, William Shaw, Mary Shirley, Ammar Siamwalla, Hadi Soesastro, T.G. Srinivasan, Tara Vishwanath, Christina Wood, Michael Woolcock, Roberto Zagha, 感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的讨论者与参与者, 应用经济研究国家委员会(印度)、亚洲发展论坛(新加坡)、泰国发展研究学院,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改革的会议发言。世界银行的若干部门审核了本书的文稿。

本书写作小组

本书由世界银行学院的写作小组撰写，负责人是 Vinod Thomas，成员有 Mansoor Dailami（第 5 章），Ashok Dhareshwar（第 1 章），Daniel Kaufmann（第 6 章），Nalin Kishor（第 4 章），Ramón E. López（第 2 章），以及王焰（第 3 章和印制经理）。小组得到了下列人士研究成果的支持：Cary Anne Cadman，Xibo Fan，和 John Van Dyck。Taji Anderson，Alice Faria 和 Jae Shin Yang 提供了支持。

弗吉尼亚州 Sterling 的电信发展公司和国际电信公司（ICI）的 Bruce Ross-Larson 和 Meta de Coquereaumont 在不同阶段对书稿进行了编辑。ICI 还完成了排版和校对。本书的选题策划、设计、编辑、印制和发行都是在世界银行出版办公室的指导和管理下进行的。

综 述

世界的某些地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有些地区出现了停滞和后退，即使是在那些以前曾实现了最快增长速度的国家中也是如此。这些明显的差异和骤然发生的逆转向我们昭示了构成发展的众多因素。其中心是经济不仅仅在速度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在质量上的增长。资源和增长的格局构成了发展的成就。

这些格局是否足以减轻贫困或改善人民生活的质量？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强有力增长率的国家少而又少？为什么很多国家（增长快慢的国家都有）在收入平等和环境保护这些重要方面的状况恶化了？治理结构是如何强化增长进程的？作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提出了发展的三个原则和一套提高增长进程质量的行动方案。

发展的成就和经济增长的进程

发展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就是提高他们构建自己的未来的能力。这通常需要提高人均收入，但它还涉及更多的内容。它涉及到更平等地享有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更高水平的性别平等，更好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更清洁和可持续程度更高的自然环境，更公正的司法体系，更广泛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更丰富的文化生活。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些问题中有些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有些则不然。如何才能影响增长的进程以使发展成就中的质量问题也得以改善呢？本书探讨的就是更快和更好的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这些问题。

《穷人的呼声：能倾听我们的意见吗？》（Narayan 等，2000 年）是最近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它指出，提高收入是减轻贫困的一部分。更高层次的安全保障和更具可持续性的环境是另外的几项内容。过去 10 年的经验和穷人的呼声就是重视这些质量因素的充分缘由。

的确，从玻利维亚、埃及和乌干达，到罗马尼亚、斯里兰卡和泰国，发展机构都正在扩大对贫困和福利的传统定义。除了个人或家庭可测算的收入外，福利包括机会，其评估标准是市场的正常运转和对健康及教育的投资与改善。它还包括安全保障，这反映在应对经济和有形冲击的脆弱性有所下降上。它也包括赋权，其评价标准是社会包容性和个人意见的表述。福利还包括可持续性，其代表是对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经济增长一向与减轻贫困具有积极的联系。以前的评估报告曾预测，发展中国家在 90 年代的经济增长率略高于 5%，或约为人均 3.2%。它们预测穷人的数量将减少约 3 亿，即年减少率接近 4%。但 1991—1998 年间的年增长率仅为预测的约 50%，人均均为 1.6%。如不包括东欧和中亚国家，这些估测值（见上述预测）中的年人均增长率接近于预测值，为 3.5%——穷人的数量不变，贫困的发生率一年下降 2%。中国则以 1978—1999 年年度人均 GDP 8.1% 的增长率，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世界银行，2000a）。

与增长相关的减贫状况差异巨大。社会进步和福利改善也是如此，不论是在教育、医疗卫生、表达意见等方面，还是在参与方面，差异都是明显的（第 1 章）。如果增长停滞或下降，社会和福利形势就会恶化。在测算增长对福利改善的贡献时，测算结果大不相同，这表明必须直接关注福利的可持续进步。它还说明，增长形成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发展结局的是增长进程的质量而不仅仅是其速度——正如影响人类健康和预期寿命的是饮食质量，而不仅仅是食品的数量一样。这就是探讨构成增长各因素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之所以成为基本任务的原因。

在注重增长进程的质量特性的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中，增长的速度更具可持续性。的确，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及环境问题的改善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的联系。例如，注重环境的可持续性有助于形成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在那些增长率起伏不定和消极影响对穷人尤其显著的地方更是如此。这表明了稳定的增长率优于停顿—再起动的增长，

尽管这种启动可能包括短期的快速增长。随着各国逐步用尽通过市场改革来提高增长率的所有可行方案，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质量因素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增长进程中的这些问题通常会在良性循环的过程中发生积极的相互作用。但在数量和质量之间也会存在难以权衡取舍的因素。某种迅速和短暂的增长依赖于以下扭曲的政策，如对资本的补贴，忽视环境外部因素以及有倾向性的公共支出配置，它们实际上会断送更具可持续性增长的前程。更加难以纠正的是增长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生矛盾这样一种情形，而这两者都是直接推动发展的因素。要想实现可持续的福利改善，解决好这些质量问题便成了基本前提。

那么什么是增长的质量呢？作为发展速度的补充，它是指构成增长进程的关键性内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了若干项这类问题的重要性：机会的分配，环境的可持续性，全球性风险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它们不仅直接构成发展的成果，而且还会扩大增长对这些成果所产生的影响，它们还要解决增长可能会带来的与环境或社会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这些构成增长进程的政策与机构的混合体正是本研究报告的中心议题。

发展的原则

同时研究发展进程的数量问题和质量问题就会使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制定的三条关键原则凸现出来：

- 关注于所有的资产：有形资产，人力资产和自然资本。
- 时时关注分配方面的问题。
- 重视良好治理的机构性框架。

主要资产

广而论之，事关发展的资产是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影响这些资产使用情况的技术进步也是重要的。为了提高增长率，人们长期以来大多关注的是有形资本的累积。但其他关键的资产也应当关注——人力（和社会）资本，以及自然（和环境）资本（专栏1）。这些资产对穷人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资产的累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力以及有形资本，这些内容决定了对贫困的长期影响。

通过重点关注有形资本，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可能被诱导去实行以对其进行补贴为代价的政策（第2章）。这会形成有益于既得利益的局面，而且难以扭转。同时，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会出现对教育和卫生保健投资不足（第3章）和对自然资本的过度开发，其原因常常是它们的定价过低和产权不明晰（第4章）。从汇总的层次上看，90年代初用于农业、能源、道路运输和水的补贴总额估计为7000—9000亿美元，其中工业国约占2/3，发展中国家占1/3（de Moor和Calamai 1997）。

专栏1 资产的积累、经济增长和福利

图1勾画出人力（H）、自然（R）和有形（K）资产是如何为经济增长和福利作出贡献的。有形资产通过经济增长为福利作出贡献。人力（和社会）资本和自然（及环境）资本也是如此，它们还是构成福利的直接内容。

人力和自然资本通过提高其收益同样为有形资本的累积作出贡献。有形资本增加了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收益，如果市场反映出这一点，还会增加了其累积的收益。除此之外，对有形、人力和自然资本的投资与众多政策改革一道，推动了技术进步和总和要素自产率的增长，进而促进了增长（第2章）。

但政策扭曲、腐败、治理不良、市场失误和外部客观条件，都可以使各国走上财产累积的扭曲或失衡之路。这种局势将使收入增长和福利改善工作发挥其潜能。更具体地说，它会导致总和要素生产率的降低和对以下领域投资不足：

- 是由于投资的盈利程度降低，生产性有形资本投资不足。其根源在于贿赂和繁琐的办事程序，或对有形投资配置的扭曲，如使投资流向某些有利可图的合同。
- 由于促进像军事和大型基础设施这类优先领域的发展，以及累退性地重新配置公共开

支，致使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 由于旨在维系自然资源的税收、特许权和规章制度被削弱，致使对自然资本的投资不足。扭曲、市场失误、隐含的政府担保以及不全面的规章可以引起：
- 对有形资本投资过度或进行重复浪费的投资，途径是通过担保来提高某些有形资产的盈利性，而担保会影响银行、公司和投资者承担风险的行为；另一条途径是降低某些自然资源的价值。
- 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投资不足，手段是低估这些资产的价格和减少用于这些资产的资源。

这些政策扭曲现象影响着对有形资本而言的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累积，这种影响会降低增长和福利水平。反之，如能解决腐败问题，并充分发挥治理结构的作用，无扭曲现象的政策将能促进资产的累积，从而有利于加快增长的速度（第6章）。因此，各国在消除政策扭曲现象，促进良好的治理，解决市场失误和外部问题之后，都能使资产投资减少扭曲，而且更加平衡。这还会导致更稳定和更持续的经济增长，导致福利水平在更广泛基础上的提高。